

大師對話錄

與柯司特對話

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譯者 王志弘、徐苔玲

／作者 Manuel Castells、
Martin Ince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C53
201055

與柯司特對話

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Manuel Castells and Martin Ince 著

王志弘 徐苔玲 譯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 Polity Press 2003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與柯司特對話／Manuel Castells, Martin Ince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 初版．-- 台北市：巨流，2006
〔民9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ISBN 978-957-732-262-3（平裝）

1. 柯司特（Castells, Martin, 1942-）- 訪談錄 2. 社會學- 論文，講詞等

540.7

95019881

與柯司特對話

原著：Conversations With Manuel Castells

原著者：Manuel Castells and
Martin Ince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王志弘、徐苔玲

封面設計：陳忠民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41 巷 12 號

電話：(07) 2236373

傳真：(07) 2264697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9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10: 957-732-262-X

ISBN-13: 978-957-732-262-3

2006 年 10 月初版一刷

定價 22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謝誌

我要感謝政體（Polity）出版社的湯普森（John Thompson）和馬特利（Gill Motley）對本書的支持，這是他們策劃的一系列社會科學大師對話錄裡的一本。不過，我更要感謝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本人為這個計畫付出的辛勞，以及經歷寫書過程的幾度困難，依然維持不墜的友誼。曼威建議我也擔任作者，從社會科學以外的角度，在知識上投入他著述的複雜主題。在整個計畫裡，他都清楚表明了自己是個「對象」，而我是作者，負責擬定整本書的架構，以及每次對談的細部問題。我先是透過電子郵件與他長談，讓我們對這種操作方式有了信心，而且樂在其中，我也非常高興能享有這個計畫所提供的嚴肅知識交流機會。此外，我也要感謝曼威和艾瑪·基索悠瓦（Emma Kiselyova）在巴塞隆納的熱情招待。

馬汀·殷斯



曼威·柯司特，1994年攝於西恩納（Siena），時值《網絡社會之崛起》的寫作期間。照片由艾瑪·基索悠瓦拍攝。

目 錄

謝誌	iv
導言	1
對話一 曼威·柯司特：生活與工作	7
對話二 創新	25
對話三 流動空間	59
對話四 社會運動與組織	65
對話五 認同	75
對話六 政治與權力	89
對話七 柯司特的世界之旅	107
對話八 知識的世界	151
參考書目	167
作者簡歷	189
索引	199

導言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是全球最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的聲名遠播，超過他畢生寓居的學術界。政治人物、企業主管、勞工領袖、非政府組織行動份子、記者和各種意見領袖，對他的著作都深感興趣。同時，他在許多學術社群裡享有權威地位，在社會科學期刊文獻資料庫（SSCI）名列前矛。2000年10月，《觀察家》（*Observer*）將他列為英國最有影響力人物的第139名，領先柴契爾夫人（Thatcher）和許多當代企業、政治與媒體領袖，就一個住在加州和加泰隆尼亞（Catalonia）的人來說，這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如本書所附簡歷所示，曼威的著作離他有關工業區位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巴黎地區的高科技廠商）很遠了，雖然經濟發展的地理學，一直是他學術生涯裡的興趣。

他的興趣跟他旅行的範圍一樣廣闊，誠如他在〈對話一〉裡提到的，這些旅行從他離開西班牙家園的初次政治流亡開始。

他的興趣廣泛，這點明了我們有許多理由，會想瞭解他這個人及他的著作。他是少數在商業界擁有大量追隨者的學院人士，因為他詳細分析了新興資訊科技。他的著作也支持了工會領袖的想法，顯現於他1999年獲頒加泰隆尼亞工聯的社會思想五一獎。同一年，他因為國際網路的研究，獲頒加泰隆尼亞工商協會的獎項，這可說是一項雙重成就，其稀有罕見，正表示他著作的獨特地位。

另外，洞見社會如何運作，以及如何變遷的明察能力，意味他的

著作也令政治人物（大部分並非大量閱讀者）感興趣，他們可能認為，他本身可以成為有份量的政治人物，卻做了生涯抉擇，不跟他們競爭。他早年身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分子的生活，已經拋諸身後。從他的價值立場來看，他依然是個有所奉獻的公民，以獨立的左翼立場自居，但他拒絕讓他的研究和分析受到政治影響。他說，「真理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因為真理讓眾人認識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從而使眾人獲得力量」。

他強調，比較非正式的政治有其重要性，這也拓展了對他著作的興趣，以及他著作裡的旨趣。他著重於非政府組織和市民組織的重要意涵，這構成了他的鉅著《城市與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1983）的主題，也延伸了他的研究，涵蓋全球的非政府組織，諸如環境、發展和人權等領域。他的分析有些出乎意料的追隨者。車臣（Chechnya）有位穆斯林軍事領袖，接受荷蘭電視台訪問談到他的動機時，揮舞著一本寫滿眉批的《資訊時代》（*The Information Age*），聲稱：「這就是我們對抗的東西！」這個人認為，柯司特對於當今世界兒童貧困窘境的分析，至少是他行動的部分正當理由。

- 誠如過去他任職的系所，例如社會系、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歐洲研究系、拉丁美洲研究系，以及其他主題所顯示的，曼威的著作也有廣大的學院追隨者。許多學域獲益於他廣博見識的啟發，包括了社會學、社會政策、政治經濟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地理學、商業與經濟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以及政治和國際事務。在每個領域裡，他都提供了新的洞識，讓他增添了原本學術專業以外的追隨者。

他在知識上的關切，在 1990 年代的三部曲鉅著《資訊時代》彙整在一起，成為他揚名世界的基礎。這套三部曲涵蓋的課題龐雜。這

套書特別關心認同和社會運動，包括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這兩項正是其中一卷的主題。書中有關科技和創新，尤其是網際網路的討論，充滿了創見，奠基於曼威在矽谷（Silicon Valley）和世界其他新進科技中心細密且持續的研究。該書也針對各種脈絡下的社會轉變提出了細緻分析，尤其是論及蘇聯（Soviet Union）的崩潰。此外，這套書還關注許多狀態下的人類處境。政治、犯罪、工作的性質、婦女和兒童的地位，以及非洲廣大地區市民社會的崩潰，都是分析的要點。到了2002年終，厚達一千五百頁的三部曲，其中兩卷是第二版，已經以英文重印了15次，且已翻譯或正在翻譯為20種語言，包括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

《資訊時代》擴大了曼威著作在全世界的讀者，也擴及許多感興趣的新群體。透過三部曲才首次認識他的人裡面，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發覺此書內文雖然很長，但比起許多更薄的書，並不難讀。比起眾多雄心勃勃的書，這套書也更能夠開啟我思考的範域。其最吸引人的特質之一，就是運用深入的研究和證據來支持論證。我從閱讀三部曲開始，連續接觸了曼威的其他著作，最後透過許多電子郵件和面對面的訪談，遇到了他本人。

曼威在罹患癌症後，寫下了《資訊時代》，這曾讓他懷疑是否能夠活著見到批判的回應。他說，這套書的成功，加上他的復原，意味了他可以再利用和寫書花費的15年一樣長的時間，在研討會和討論課裡談論這部書。但曼威並未選擇這條路。相反的，他在新科技的研究進一步深化，2001年出版了《網際網路銀河》（*The Internet Galaxy*），以及2002年跟佩卡·海莫能（Pekka Himanen）合寫了《資訊社會與福利國家：芬蘭模型》（*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Finnish Model)，同時積極參與在芬蘭、南非和其他國家的高科技與經濟成長研究(〈對話二〉會提到)。此外，他的關懷還擴及穆斯林(Muslim)歐洲和俄國(Russian)遠東地區等多樣課題，這項興趣大都歸功於她的俄羅斯妻子艾瑪·基索悠瓦(Emma Kiselyova)。

世界各地都希望獲得曼威的建議。但他不是顧問，也不是未來學家。他研究的是他感興趣，可以滿足他的學術和社會關切的事物，而非為了帶來收入，即使企業界和政府對他深感興趣。最吸引人的是，對於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他不表達意見。相反的，他的著作乃基於真實事件的嚴謹經驗分析，蘊含的是洞見，而非冥想揣測。他著作的正字標誌是詳細的田野工作和淵博學識。他曾被拿來和馬克思(Marx)、黑格爾(Hegel)、笛卡兒(Descartes)和韋伯(Weber)等思想家比擬。雖然他覺得這種比較惹人發笑，但韋伯最合他的口味，因為韋伯同樣從事大量研究來支持分析。少數惹曼威生氣的辦法之一，就是把他比擬為機場書店商業區最愛的那種口無遮攔的未來學家。

他的分析也不僅是理論性的見解。反之，曼威是個政治動物，他的著作展現了真心真意的關切，有時候還帶著憤怒：譬如在本書裡，他回答有關孩童的剝削，以及富裕世界忽視非洲問題等提問時，就是如此。同時，他對於諸如「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和「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組織(解決他所描述的、時有艱困的世界裡的真實問題)的讚賞，乃出於人道，而非學術興趣。

曼威經常懷疑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動機。但他也堅持運作中的社會
5 需要有能力、不腐敗的政治人物和其他公僕。他和許多政治領袖關係

密切，例如巴西前總統兼學術上的合作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南非，他則是穆比基（Thabo Mbeki）總統擔任主席的一個委員會裡的成員（參見〈對話二〉），致力於掌控該國和該區域的技術未來。

曼威著作的廣博和份量，可能會誘使本書讀者在書裡尋找《資訊時代》和他其餘著作的便利指南。但我們希望讀者不要懷抱這種心態來閱讀。其實，本書有一些更具開創性的目標。其中之一，就是發展他先前著作裡並非主要焦點的分析領域，例如政治體系。另一個目標是延伸他有關網際網路和一般科技的研究，既是接續原來的興趣，也因為這個領域變化太快了。主要是在第七次對話裡，本書也提到了曼威對於世界不同區域所面對的主要議題的觀點，包括他其餘著作裡未曾觸及的地區。不過，另一項目標則是讓曼威有個機會，去解釋他理論著作的某些實際後果。本著這種精神，我們的做法比較不正式，除了分析，也有評論。我們也希望〈對話一〉有關他的生活和影響的部分，能幫助對曼威著作感興趣的眾多人士。針對曼威的學術研究和不斷變化的關注，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術分析和評論，目前至少有三本討論他的研究的書正在進行。他的著作的區域應用，也引發日漸增長的關切。2003年將出版一本針對拉丁美洲全球化議題的書，來和柯司特辯論，還有一本在南非脈絡下討論他的研究的書。讀者也會感興趣曼威如何談論他的生活，還有諸如1968年巴黎事件，以及阿連·杜漢（Alain Touraine）、尼可斯·普蘭札斯（Nicos Poulantzas）和卡多索等人對他的影響。

如書名所示，這本書是一連串的對話，如實紀錄，盡量減少編輯。這本書大部分是在曼威所命名的「流動空間」裡，透過電子郵件

寫就的。但是〈對話五〉和〈對話六〉，分別討論認同和政治的部分，則是於 2002 年 2 月在「地方空間」舉行，更準確的說，是在巴塞隆納。

馬汀·殷斯 (Martin Ince)

倫敦

2002 年 10 月

martin.ince@britishlibrary.net

對話一

曼威·柯司特：生活與工作

馬汀·殷斯：曼威，這本書談的是你的想法和著作，重點放在你的思想如何發展，導向何方，還有下一步是什麼。但是，你迄今為止的生活也很精采，對你的書感興趣的人，應該也會想知道你的生活，以及這在你的知識發展裡扮演什麼角色。請大致說一下好嗎。 7

曼威·柯司特：我在 1942 年 2 月 9 日出生在西班牙曼查（La Mancha）地方的一個小鎮，就是阿巴塞特（Albacete）省的赫林（Hellin）鎮。但是，我在那裡沒有根。我的雙親只是為了工作，才在那裡短暫停留，一年後，我們就都離開了。因為我自己和家裡其他人都都不認識任何當地人，所以，我從來沒回去過，如果你對我的身分認同感興趣的話，出生地可是會誤導的。我父親費南多·柯司特·阿卓安森（Fernando Castells Adriaensens）是個金融檢查員，我母親喬瑟芬娜·奧立芳·艾斯卡頓（Josefina Olivan Escartin）是會計，兩人都 是西班牙財政部的公務員。

我父親的家族應該是來自加泰隆尼亞，可以往前追溯到 16 世紀。但是我父親和祖父出生在瓦倫希亞（Valencia）。家族裡有軍旅傳統。我從未見過的祖父在工兵部隊（Army Corps of Engineers）裡擔

- 8 任高階軍官。每一代長子的長子都是如此，直到我這一代。我招募我的堂兄秘密反抗佛朗哥（Franco），當時他就讀軍校，結果入了獄，因此破壞了這個尊貴的軍旅傳統，他父親立即被解除職務，當個閒差。我父親是法蘭奇黨（Phalange Party）黨員，在內戰期間與佛朗哥勢力同一陣線，對抗共和派。後來，他對佛朗哥失望，這讓他原本光明的官場生涯受到了限制。我母親出身畢斯卡斯（Biescas）的傳統天主教農民家庭，位居阿拉貢底里牛斯（Aragon Pyrenees）地區的一個村落。她是個很聰明，能言善道，很實際的女人，在她的時代和處境裡，算是非常先進，而且總是嘗試從事她的專業。我只有一個妹妹，愛琳·柯司特（Irene Castells），小我兩歲。她是巴塞隆納大學的歷史教授。我總是敬愛她，這輩子我們倆一直非常親近。我父親在他的金檢員工作生涯裡不斷往上攀升，所以我童年在馬德里、卡塔吉納（Cartagena）和瓦倫希亞度過。最後，我在巴塞隆納唸完中學，然後就讀巴塞隆納大學。

多談一些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加泰隆尼亞身分。

由於我青春期的關鍵歲月在巴塞隆納度過，也因為我父親家族的最初根源來自巴塞隆納，加上我自己的感受，我稱自己是加泰隆尼亞人。不過，我家並不講加泰隆尼亞語，而且在佛朗哥執政時期，公共場合禁止說加泰隆尼亞語。但是我就讀巴塞隆納大學時，自己學會了加泰隆尼亞語，主要是為了政治理由。我忘了大半，但我還是聽得懂，而且越說越溜。這有助於我的認同。你可以說，我是個加泰隆尼亞國族主義者，不過，當然不是個分離主義者，也不是國族主義政黨

的支持者，我通常支持加泰隆尼亞社會主義黨，該黨採取聯邦主義立場。

你的學校和大學教育很早熟，是這樣嗎？

我在 1958 年進大學，那時 16 歲（我比通常完成中學的年紀早了兩年）。在父親的強大壓力下，我向來是個優等生。我在巴塞隆納大學研讀法律「學位」（Licenciaturas）和經濟「學位」（在西班牙系統裡，Licenciaturas 是在大學裡讀五年，是不走學術路線的人通常會拿的學位。）

9

我的要務是文學和戲劇。我曾獲得學生和學院的文學與戲劇獎項。但是在佛朗哥時期的高壓氣氛裡，表現自我就可能惹起政治警察。所以，他們查封了我們的刊物，禁演我們的戲劇後，我受夠了，1960 年加入了秘密抵抗，那時候我 18 歲。當時，巴塞隆納大學只有少數幾個活躍於反佛朗哥運動的秘密團體。這項活動風險很高。很可能會遭到逮捕、拷打，送入監獄服刑幾年，被迫離開大學，登上黑名單，不能擔任公職。所以，在 1960 年，一萬四千名學生裡，大概只有不超過 50 名活動份子。但是我們相當堅定，而且非常秘密。三個主要團體是加泰隆尼亞國族主義者、共產黨（規模最大），以及名為加泰隆尼亞工人陣線的獨特激進團體（加泰隆尼亞語縮寫是 FOC），當然裡頭沒什麼工人，成員有各種意識形態的主張者，從天主教徒到馬列主義者、社會民主派，以及無政府主義者。

我基本上自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雖然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我痛恨共產黨，因為他們非常權威，而且按照我當時的看法，他們背

- 叛了西班牙內戰的革命。所以，我就加入了這個 FOC 團體，很小，但是非常活躍（最後成為加泰隆尼亞社會主義黨的成員，前者又是 1983 到 1996 年間執政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黨的一部分）。我的生活完全給政治佔滿了。我的考試依然過關，但是我大量閱讀，唸一大堆歷史、政治、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理論、第三世界議題、政治經濟學。我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學者。我想當律師，捍衛工人和公義。但是
- 10 我想寫作。我總是想寫東西，而且期待革命之後，我真的有時間可以寫小說、詩，還有劇本。但是在 1962 年 5 月，我們太成功了。結合了其他反佛朗哥團體，我們在大學和幾間工廠裡，成功組織了一場罷課罷工，和阿斯徒瑞亞（Asturias）罷工的礦工團結在一起，抗議政府。這是對專制統治的一次重大挑戰，政權卻沒必要的被這群跟傳統共和派政黨沒關係的一小群富家子弟給嚇到了：這是新的西班牙反抗。所以，他們便打擊我們。我大部分朋友都被逮捕、拷打，關了好幾年。我很幸運，秘密穿越邊界，抵達法國。我沒時間完成學業，沒有錢，舉目無親。

但是你前往巴黎，而且過了一段時日以後，獲得成功的學術生涯。

我前往巴黎。我手上有位西班牙無政府主義建築工人的地址，他跟我在巴塞隆納所屬的抵抗團體有關係。他幫了我。我獲得政治難民身分庇護，還有法國政府給政治難民的一小筆補助金。我真的很需要，因為在这一切事情以外，還有我那 18 歲的未婚妻，出於浪漫的衝動，逃離了巴塞隆納的父母家，到巴黎和我會合，而且很自然的，

我們有了小孩，我唯一的女兒，娜莉雅·柯司特（Nuria Castells）。所以，我在巴黎大學索邦（Sorbonne）校區的法律與經濟系註冊，完成了我的公法與政治經濟學學位。我還兼職（在出版社當編輯）以便付租金，分擔照顧小孩。我的未婚妻，這時成了妻子，也是全職學生。六年後，我們以非常友善的方式離了婚，現在還是朋友。我們只是太早結婚了……。她目前住在巴塞隆納，是個很有名的人口學家。我一向跟女兒很親，娜莉雅和我，我們兩個非常親密。她是我生活的定錨，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事物。她目前住在日內瓦，擔任聯合國的經濟學家，和先生小孩住在一起，我們每天都會通電子郵件。

11

我在索邦獲得了「文憑」。這時候，我對於巴黎流亡圈裡的西班牙政治很失望，所以，我在 1964 年決定，我的未來是在學術界，因為那比任何工作都要自由，而且接近我的知識和政治興趣。我選擇了社會學，因為它是最具政治意涵的學科，但是我對社會學毫無概念。所以，我問周遭的人，有誰在做「勞工階級社會學」〔結果，這在學院裡稱為「工作社會學」（sociology of work）〕。答案是阿連·杜漢（Alain Touraine），法國社會學的新星。我完全不認識他，便去找他。我問他，是否真有個社會學可以給我工作（以及一筆開始的獎金），讓我靠研究勞工階級的階級鬥爭策略謀生。他笑了，說沒錯。然後我問他，我是否可以跟他做論文，研究阿斯徒瑞亞的礦工罷工，他也答應了。他後來告訴我，他受到我的天真和決心所誘。但我才是真的被他誘惑的那個人。幾個月內，我便跟著他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註冊博士課程，這是巴黎的法國菁英社會科學研究院。